

坊间名人

绝壁悬崖自怡然

吕伟达

我与安家正先生相识较早。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烟台地区举办群众文艺会演时，先生当时是文登县文化馆文艺创作组负责人。在会演剧评会上，先生总是先声夺人，第一个发言，他晃着大脑壳，语言尖锐犀利，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撸生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先生调到《胶东文学》编辑部担任主任，我常去找他奉上拙作。他总是快速浏览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或他觉得还行的，便将稿子留下。

我担任王懿荣纪念馆馆长时，先生和我一见面，总是谈论王懿荣和纪念馆的事儿。特别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总是提出远、中、近不同时期的一些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常使我脑子一亮，有了目标和方向。即使他生病住院期间，我去探望他，他和我谈的还是王懿荣研究这个话题。

上世纪90年代末晚秋的一天，他陪峻青老参观王懿荣纪念馆，在去探访古现李家村后，王懿荣墓地上山路上，先生气喘吁吁，仍不忘照顾峻青老攀登沟沟坎坎。因是深秋时节，已有阵阵凉意，先生浑身被汗水湿透，我为刚出院的他捏了一把汗。当听到先生爽朗的笑声和大嗓门的谈吐时，我悬空的心放了下来。

先生笔耕60余载，沉潜力修，写出1000万字、40多部作品，是烟台知名教授、作家、史学家、文学家、评论家、民俗专家、文化学者、地域文化专家。他的这些呕心沥血的作品，都是他和时间竞跑

和自己赛跑的成绩单。

《胶东通史演义》是先生最长的一部作品，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他把胶东7000余年历史和文化系统整合，是在轮椅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堪称筚路蓝缕的拓荒者。北京电视台杨子林先生在序中说：“他是聚集起生命的全部能量，在理想的峭壁上奋力攀登。脚下的深渊，头顶上的蓝天，白云缠绕，阳光拂煦，当他攀登上悬崖峭壁之际，我们便看到了这部书。”

凡是接触过先生的人，都被先生的毅力所折服：他患糖尿病30余年，2000年时，他为写《戚继光》，累得急性肝坏死，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右眼失明，左眼近盲；右耳失聪；右手指因累年握笔而变形；他的冠状血管梗塞，安了4个支架。2008年除夕，他写完《秦淮悲歌》时，累得患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腿脚不能打弯，大小便失禁，颈动脉又安上了支架。即使如此，他仍坐在轮椅上，完成400万字的《安家正文集》新八卷，总题目就是“苟延残喘，犹自奋蹄”。他在著作《近盲集》代序中说：“面对死神纵声大笑！他说：年龄渐长，身体日差。死神的阴影常笼罩心头，他来敲门了。我把他拒之门外，厉声喝问：你将如何将我带走？他嗫嚅而不答，我坦然道：我替你回答吧，无非三：一曰疾病折磨而死；二曰意外事件死；三曰权贵迫害之死，可对？他猥琐不敢应，我仰天哈哈大笑……”这是先生面对死神的态度。

先生生前多次告诉我说，他所得到的一切，功劳都要归功于老伴儿邹淑香！邹老师是他第一读者、第二作者，他们夫唱妇随，共同探讨、争论这些大作。邹老师除了照料先生的写作，同时还兼任多种身份：护理师、营养师、采购员、专业护士和保姆。每天起床帮先生穿好衣服，侍理下床大小便，饭前15分钟打胰岛素，饭后半小时吃上一大把中西药；先生住院要送上一日三餐；先生写作需要资料时，邹老师要麻利地登上双重板凳，在书柜顶上翻腾。她是一个甘为人梯的优秀共产党员，一位无私奉献的贤妻良母，她的事迹使我想到了王懿荣的曾祖姑王照圆与郝懿行夫妻俩的恩爱故事。这也许是咱烟台人的“特产”，在烟台这方土地上尽出现这类人生佳话。

前不久，我与先生通电话，还说待天气暖和了，去文登看先生，谁知竟成了奢望。

先生一生，不求别墅，不求轿车，只求一日三餐足以充饥，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一身正气使之安之若素，四壁图书两张几（饭桌、课桌），三五知己一盘棋。终老山林情自绿，一生白丁人如诗。

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我作打油诗一首，仅当一小小小花环，以表对先生思念之情：

虬曲龙蟠跃九天，悬崖绝壁自怡然。
寒来暑往春秋茂，雨打风吹品节坚。
日影婆娑迎霞光，星光暗淡隐婵娟。
年年岁岁芬芳发，妆点人间笑开颜。

一生快意即文章

于建波

1963年，安家正从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文登一中报到，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在那个年代，文登一中的高考升学率全国有名，最高时达到95.7%！年轻的语文教师不修边幅，一米七的个头，虚胖，稀发，布衣，走起路来很快很轻，似乎在跟时光赛跑。可能少年读书用功过度，眼球微凸，米黄色的塑料镜框镶嵌着瓶子底一般厚的镜片，一道圈套着一道圈，在讲台上上课时隐隐闪亮。

如果给初执教鞭的安家正印名片，只需印一个字：傲。初来乍到，他就自诩自己是“语文教学的权威”！他总要到总务处领两三个个人份的备课纸，他总能让语文组的电灯泡最后一个熄灭，但是四十五分钟的一课时太短，他肚子里的“玩意儿”又太多，讲着讲着，趣味性压倒了知识性。他的博学和健谈还是得到众多师生首肯，用校领导的话说，“听安老师讲课，全班同学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正当春风得意之际，“文革”开始了，这位刚把高中语文翻熟的教师因一句“我是语文教学的权威”被打成“黑帮”，离开了三尺讲台，走上了学校的大戏台，胸前当然挂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接着，一根扁担，两只粪桶，和其他“黑帮”一起把全校一两千名教职员和学生的粪便挑到永远喂不完的菜园里。

还是微胖，布衣，只是头发越来越少，而立之年的男人竟然完全谢

顶，只留下脑壳下的一圈黑发，好似一围城墙，日夜守护着头顶那块知识的高地。

如果说安老师是身处逆境愁掉了头发，那就大错特错，在他的人生字典中，从来没有“愁”字。不论怎样挨批挨斗，晚上坐在床上，先看几个钟头书，然后眼镜一摘，仰身倒下，头刚碰枕头，立马开始打呼，他用鼾声强调在睡着时也要“发声”。

“文革”结束后，安老师被调到乡下一所中学任教。在那里，他一边教学，一边写作。一篇篇散文、一部部小说，就像生产队饲养室下小猪那样，这个刚落地，那个又露头，很快，他被调到县文化馆创作室，“教书匠”摇身变成“写书匠”。

如果离开了勤奋，再奇特的“聪明绝顶”也会变成无源之水，渐渐地被消耗干涸。在安老师的提包里，永远有一沓自制的卡片，烟盒大小，无论读书看报还是与人攀谈，精彩之处，他必录之。有一次，著名军旅作家赛时礼回文登省亲，当问到老英雄时下的健康状况时，赛老一笑，一句插科打诨的笑话带过，众人嘻哈之际，安老师却拿出笔纸，飞快地将这句“赛氏玩笑”记进了他的卡片，多年后，又写进了他给这位当年骑着毛驴杀鬼子的赛瘸子连长撰写的传记中。

很多人都知道，安老师一生著书四十部，千万余字，却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能知道他这一生做过多少张卡片。倘若把这四十部书比喻

为他精心酿制的四十窑“女儿红”，而这些久已泛黄且又无法细数的“安记卡片”，不正是他毕生储存的一仓又一仓的红高粱吗？

创作离不开生活，为此安老师曾留下诸多“八卦”，至今说来令人捧腹。试举一例：一年夏天，他去昆嵛山采访，当他推着笨重的自行车一步一甩汗地爬到山半腰时，迎面一个青年骑着“大金鹿”，双手撒把像一匹野马从他身边呼啸而去，嘴里还吹着口哨！如此得意之举，岂容毛头小儿独享，于是，四十多岁的上坡人急急走上坡顶，汗也不擦，掉转车头，呼地一头冲下坡去。“生活”体验了，代价是再爬一次坡，又何妨？

因为编撰县志，安老师对天福山起义有了翔实的了解，也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天福山起义领导人之一于得水的原配夫人因战争年代作战负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把党员关系弄丢了，看到报道后找到了安老师。身为党外人士的安老师亲自带着老太太，捧着于得水的大校军衔和有关资料，到县委组织部反映史实，争取为老抗日女兵恢复党籍……

一生快意为文的安老师走了，遗憾的是我只存留有一张他的孤本照片，是他人生中最美的形象：微胖，布衣，脑壳下的一圈黑发像一围城墙，日夜守护着头顶那块知识高地……

文字不老毛贤君

李镇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牟平县（今牟平区）一隅滨海小镇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采访—写稿—寄稿—翻阅报纸”。读报是必修课，我经常在一些报刊上读到毛贤君老师的文章，文风朴实、通俗易懂，令我非常佩服。

我和毛老师终于有了一面之缘，是在2014年《烟台晚报》“烟台街”栏目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参会者是我耳熟能详的名人：张景芬、高承柱、房宗惠、何冠奇、彭守业……当然，还有我仰慕已久的毛老师。

散会后，我和毛老师结伴而行，他身材较胖，腿脚不太灵便，拄着拐杖，下楼梯时有些气喘，额头沁出细细的汗珠。我说，毛老师要保重身体啊，大家还等着拜读你的新作呢。他笑着说，他是“三高”老人，不过不碍事，都是福病，天天吃药维持就好。至于写作，活到老，写到老，他会一直写下去。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捣鼓这个！

两人相见恨晚，毛老师对于我这个初次见面的晚辈，丝毫没有保留，推心置腹地交流起自己创作的心得。我结合阅读过的他的文章，更觉受益匪浅。

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再见面，然而，我依然能在各种报刊上一次次读到他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字。见字如面，我以另一种方式接受他的教诲，眼前便会浮现出和毛老师相见时的温情画面。

我找到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公众号推出的毛老师文章《老街所城掌故多》。文首的编者按梳理了毛老师的生平和创作历程：“毛贤君，生于1943年1月23日，浙江奉化岩头镇人，在烟台制革厂工作，退休后，曾被聘为《胶东文学》编辑部特约编辑，是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多年以来，他勤于走访，是一位记录口述史的专家；他笔耕不辍，为挖掘整理烟台历史文化做出了贡献。《水滴集》里记录了他一生的足迹，《芝罘历史文化》丛刊里发表了他大量的文章。”

我想，这些文字应该是对毛老师的“盖棺论定”吧。凝视着文章配图中毛老师的照片，我的眼角湿润了。我想说，毛老师，你的文字永远不会老。

投稿邮箱：ytwbytj@126.com

编辑微信：13954535319